

庄周的《庄子》和郭象的《庄子注》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其深邃思想和深刻、丰富的哲理是中华思想文化的不断源头，展开对《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既有重要的哲学史、思想史意义，也有深刻的哲学理论价值。

康中乾 著

从庄子到郭象

——《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康中乾 著

从庄子到郭象

——《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



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段海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庄子到郭象——《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康中乾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1467-5

I. ①从… II. ①康… III. ①道家思想—研究②《庄子》—研究③《庄子注》—研究 IV. ①B223.55②B2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422 号

从庄子到郭象

CONG ZHUANGZI DAO GUOXIANG

——《庄子》与《庄子注》比较研究

康中乾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1467-5 定价: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庄子》一书，自从魏晋士人，特别是竹林贤士和中朝名士的“妙演”、“隐解”、“发明奇趣”后，其思想价值被昭显于世，熠熠生辉；自此以后，它成为社会上层人士的必读典籍，探其远情者固然耽玩永年，揽其余芳者也能暂味溢流，都“足旷然有忘形自得之怀”（郭象：《庄子序》）。至唐代，《庄子》又取得了“经”的地位。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二月诏以庄周为“南华真人”，《庄子》遂成为《南华真经》，从此它与佛家的经藏、儒家的“五经”有了同等的地位和意义。宋明士人妙演、发明的当然是儒家的经典，表面上是对佛教、《老》《庄》作批评和抑制的，但实际上，宋明理学家们不会不读《庄子》，因为就是要“抑”《庄》也得先读它，因此宋明士人对《庄子》仍是有所玩味的。近现代以来，人们用新思想和新方法研究《庄子》，其强劲之风至今犹然。

《老子》在汉初被重视。这与汉初兴起的以“无为而治”思想为指导原则的黄老之学的流传不无关系。此后，《庄子》被冷落、沉寂了三百多年。这大概因为庄子的“道”论——无论是其“本根”之“道”，还是其“逍遥”之“道”——不合汉代知识阶层的“经学”口味吧。到了魏晋之际，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社会氛围中，庄子思想却颇受魏晋士人的重视；汉初以来的“黄老”之称此时也变为“老庄”甚或“庄老”之称了。如果说正始玄音尚以注《老》为方式来展开和完成了其“以无为本”的“无”本论玄学理论的建构任务的话，那么竹林清音则从《庄子》中发掘了其社会批判精神，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论，使玄学思想向超越、放达一途趋进。到了西晋中朝时期，经裴頠等人对竹林玄学末流那种以故意“作达”为目的而导致了社会“名教”严重危害的现象和风潮的批评、纠正后，至郭象则

以《庄子注》完成了对玄学“有”和“无”、“自然”和“名教”的理论整合和统一的任务,从而完成了玄学关于建构宇宙本体思想的逻辑进程。

魏晋时代注解《庄子》者不少。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庄子》中说,当时有崔譔、向秀、司马彪、郭象等的《庄子》注本,有李颐的《庄子》集解本,有王叔之的《庄子》义疏本,还有李轨等人的《庄子》音本。但在这些注解本中,“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他自己对《庄子》作释文也“以郭为主”矣。可见,在陆德明之时关于《庄子》注释本仍有多种流传。但唐以后就只有郭象的《庄子注》流传了。这本《庄子注》是魏晋玄学思想理论的极为重要的材料。

近两千年以来《庄子》研究从未中断。人们以“经”、“疏”、“因”、“解”、“义”、“故”、“音义”、“口义”、“正义”、“章义”、“义证”、“义绎”、“核释”、“注释”、“补正”、“札迻”、“札记”、“点勘”、“集解”、“集释”、“斟补”、“新证”、“拾遗”、“杂志”、“新笺”等方式、方法来解《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近现代以来,《庄子》研究方面不仅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之类的集以往研究成果之大成的著作,也有孙诒让《庄子札迻》、刘师培《庄子斟补》、马叙伦《庄子义证》、王叔岷《庄子校释》等精于考证的著作,还有张恒寿《庄子新探》、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崔大华《庄学研究》等借助于西方哲学的理念和方法,吸收了考古研究的材料成果,将历史考证与义理发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著作。但究其研究内容,无非是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历史、考证的研究;二是思想、义理的发掘。前者以历史考证为主,试图以还庄子和《庄子》的历史真面目;后者则重点对《庄子》的思想作“隐解”和“妙演”,以发掘《庄子》的思想意蕴。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能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往往是二者结合进行的,只是在不同的研究者中侧重点不同而已。但不论何种研究,其目的都是为了在《庄子》中“发明奇趣”,以畅扬时风。

现在,我们要研究《庄子》和《庄子注》的思想,尤其要对这两篇经典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那么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呢?首先要确定《庄子》和《庄子注》的主要问题,既要注意到二者思想相同或相似的一面,又要看到二者思想间的差异性。郭象注《庄子》时共注了32篇,有2971条。这些注文当然都是阐述、发挥庄子思想的,肯定有与庄子思想相一致的地方,起码在大的思路向上有相一致处。但郭象注《庄》时肯定要结合其时代的思想需要和任务,

要融进魏晋玄学的思想观点,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何况郭象注《庄》的目的就在于“振起玄风”,以阐释、解读、发挥庄子的思想来宣扬自己的玄学思想和主张,庄子思想与郭象思想毕竟是不同时代的思想理论,二者间肯定有差别存在。所以,在《庄子》和《庄子注》之间客观存在着进行比较的根据和可能。

《庄子》一书尽管恣肆汪洋,奇谲诡怪,但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是庄子及其后学们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感受、体悟、看法而寻求处世之道时所发的议论,所以社会、人生思想是《庄子》一书的一个基本的内容。但究竟如何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呢?庄子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感悟、体会,提出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人如何来处世的人生之道;而且,作为一个思想家、哲学家,庄子没有将人的处世之道变成一种权术,他讲的是哲学,是人的精神自由境界,这就是庄子的“逍遥”说。庄子的“逍遥”说既是人的精神自由境界,也是一种得“道”,是一种“道”论。就是说,庄子的社会、人生思想是与其“道”论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道”论思想是其人生、社会思想的思想基础。有了“道”,或者说提出了“道”后,人就要把握这个“道”,即得“道”,如果人不得“道”,它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所以,庄子在提出“道”后,或者说在提出“道”时,探索和论说了如何得“道”的问题。如何得“道”?这里面既有认识问题,也有体悟问题,这就涉及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内容。可见,在研究《庄子》的思想时,我们要以其社会、人生思想为开端,以“道”论思想为中枢,以认识论、方法论思想为两翼来铺开。

郭象在注《庄》时,尽管目的不同,旨趣有异,但他首先关心的也是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郭象作为生活于西晋社会这一特定时代中的人,他不可能不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社会、人生问题不发表看法。方立天先生曾说:“陈寅恪先生十分强调玄学家与政治的内在联系,指出,玄学一旦脱离政治,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是十分深刻的。”正是基于玄学与政治的联系,从玄学如何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出发,他将整个魏晋玄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①。郭象的确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人生的议论,并提出了所谓圣人处世的方略,我们把这些思想统称为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但与庄子一样,郭象作为一位哲学家、玄学家,他没有只对社会现象就事论事,没有把对社会、人

^① 方立天:《玄学的范围、主题和分期》,《文史哲》1985年第4期。

生问题的处理仅引向权谋韬略,他讲的是玄学,将人生问题引入了形上本体论中,这就是他的“独化”思想。“独化”论是郭象玄学思想的亮点和特色所在。郭象既然讲“独化”,他就要把握住它,倘若把握不住,那么这个“独化”也就失去意义了。怎么把握“独化”呢?这里首先有个认识论问题;同时,要能真正把握住“独化”,就不只是去对其作认识,还有体悟问题,这又涉及了方法论问题。所以,在研究郭象《庄子注》的思想时,应以其社会、人生思想为起点,以“独化”论思想为中心,以认识论和方法论为两翼来展开。

这样,我们在对《庄子》和《庄子注》思想作比较研究时,除了对庄子和郭象的有关生平和著作作以适当介绍外,可重点厘析出四个问题:一是关于庄子的“逍遥”论与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说,这是庄、郭的社会、政治、人生等方面的思想;二是庄子的“道”论与郭象的“独化”论,这是庄、郭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思想,他们此方面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很有影响;三是庄子的“相对”说与郭象的“相因”说,这是庄、郭的哲学方法论思想,是把握他们本体思想的思想进路,而且他们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颇有影响;四是庄子的“忘”说与郭象的“玄冥”说,这是庄、郭的境界论思想,是把握了“道”、“独化”后的境界,同时也是人生的境界和修养的功夫等。四是要对庄子和郭象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本体思想作一评论和总结,这种总结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的逻辑演进来为庄、郭的本体思想作一定位。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第一章 庄子、郭象生平和著作简说 | 1 |
| 第一节 庄子其人其书 | 1 |
| 一、庄子其人 | 1 |
| 二、《庄子》其书 | 11 |
| 第二节 郭象其人及其著作 | 26 |
| 一、郭象其人 | 26 |
| 二、关于郭象的《庄子注》 | 29 |
| 第三节 从《庄子》到《庄子注》——庄子思想在魏晋的兴起 | 42 |
| 一、从道家到新道家 | 42 |
| 二、正始玄学与老学的兴起 | 47 |
| 三、竹林玄学、郭象玄学与庄学的兴起 | 54 |
| 第二章 庄子的“逍遥”与郭象的“内圣外王” | 62 |
| 第一节 庄子的“逍遥”论 | 62 |
| 一、战国时代 | 63 |
| 二、人生感受 | 69 |
| 三、处世方略 | 78 |
| 四、“逍遥”境界 | 86 |
| 第二节 郭象的“内圣外王”论 | 94 |
| 一、西晋社会 | 95 |
| 二、社会与君主 | 105 |

| | |
|------------------------------------|-----|
| 三、社会与“名教” | 111 |
| 四、社会与“自然” | 119 |
| 五、“内圣外王之道”(“名教”即“自然”) | 127 |
| 第三节 关于庄子与郭象的社会人生思想 | 135 |
| 一、庄、郭社会人生思想的时代和社会烙印 | 137 |
| 二、关于庄、郭的社会人生思想 | 140 |
| 第三章 庄子的“道”与郭象的“独化” | 161 |
| 第一节 庄子“道”论 | 161 |
| 一、道的种类 | 161 |
| 二、“天道”之“道” | 165 |
| 三、“本根”之“道” | 174 |
| 四、“逍遥”之“道” | 185 |
| 第二节 郭象“独化”论 | 195 |
| 一、郭象之前的玄学“无”、“有”论 | 196 |
| 二、郭象对本体问题的自觉运思 | 208 |
| 三、郭象“独化”范畴的内在结构 | 214 |
| 四、郭象“独化”论的思想体系 | 220 |
| 第三节 关于庄子与郭象的本体思想 | 232 |
| 一、庄、郭本体思想的提出目的 | 234 |
| 二、庄、郭本体思想的形式和内容 | 239 |
| 三、庄、郭本体思想的性质和意义 | 249 |
| 第四章 庄子的“齐物”与郭象的“相因” | 257 |
| 第一节 庄子的“齐物”说 | 257 |
| 一、庄子的“相对”说 | 257 |
| 二、庄子的“齐物”说 | 274 |
| 第二节 郭象的“相因”说 | 283 |
| 一、天地、阴阳等的“对生”说——郭象的“外相因”思想 | 284 |
| 二、“性足”说——郭象的“内相因”思想 | 290 |
| 第三节 郭象“相因”法对庄子“相对—齐物”法的继承与发展 | 295 |

| | |
|---|-----|
| 第五章 庄子的“忘”与郭象的“玄冥” | 300 |
| 第一节 庄子的“忘” | 300 |
| 一、庄子的“坐忘” | 300 |
| 二、庄子的“道忘” | 311 |
| 第二节 郭象的“玄冥” | 323 |
| 一、“无心” | 324 |
| 二、玄冥之境 | 331 |
| 第三节 郭象“玄冥”思想对庄子“坐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336 |
| 结语 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庄子和郭象 本体思想的历史地位 | 349 |
| 一、先秦哲学与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摊出 | 353 |
| 二、两汉经学与宇宙发生论问题 | 357 |
| 三、魏晋玄学与宇宙本体论问题 | 362 |
| 四、隋唐佛学与心性本体论问题 | 363 |
| 五、宋明理学与伦理学本体论问题 | 370 |
| 主要参考书目 | 377 |
| 索 引 | 379 |

第一章 庄子、郭象生平和著作简说

第一节 庄子其人其书

一、庄子其人

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这没有问题。但他究竟是战国时代什么时期的人?他的具体生卒年如何?这就有了诸多争议。《庄子》一书是先秦的子书,这也没有问题。但《庄子》一书究竟具体成书于何时?它原本到底有多少篇?它的作者是庄周一人还是包括庄周在内的多人?它的体例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其篇名又是何时被命定的?这等等的问题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庄子,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这样记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狐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羈。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庄子》中说:

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

从这两条材料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庄子的这样一些情况:①他姓庄,名周,字子休(关于庄子的字,陆德明只在注释中提出,并未讲其所据史料);②他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是同时代的人;③他是梁国蒙县人,曾作过漆园吏;④他生前很有名望,楚威王曾聘他为卿相,但被他拒绝了,终生未仕,过的是隐者生活。

这样来传记庄子,这对历史资料相对贫乏的先秦人物来说原本已不错了。但这仍显得笼统和模糊。对于其思想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庄子,后人总不满足对其生平做这样概括的了解,而总想多挖掘出一些具体的材料和事迹。围绕庄子其人的研究问题有:

1. 关于庄子的生卒时间

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的庄周究竟生于何时?对此,目前有这样几种说法:或前 369—前 286 年^①,或前 375—前 300 年^②,或前 328—前 286 年^③,或前 328—前 295 年^④,或前 355—前 275 年^⑤。现在学界大多数人认可庄周的生年为前 369 年(周烈王七年。是年为魏惠王二年、楚宣王元年),卒年为前 286 年(周赧王二十九年。是年齐灭宋)。这是马叙伦《庄子年表》所考证的结果。

可以肯定,关于庄子生卒年问题的考证研究远未结束。在这里,对我们有启发意义的倒不是某一确定结论,而是得出结论的依据和方法。冯友兰说:“凡是研究历史,无论哪一段,总得有几个大家都认为是可靠的史料作为支点,以它为标准,鉴别别的史料,不然,研究就无法进行。”^⑥庄子生卒年问题的研究也正是这样。人们无论得出何种研究结论,总要有一种历史的“支点”,这就是历史材料,也是我们分析、判别问题的参照系;否则的话研究是无法下手的。那么,人们在研究庄子的生卒年问题时所依靠的历史“支点”是什么和

① 这是目前学界多数人的看法,如马叙伦:《庄子年表》、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和《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等。

② 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③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 6 页(这是他引述的范文澜的说法)。

④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6 页。

⑤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3 页。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67 页。

能是什么呢？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一书中考证庄周的生卒年代时涉及这一问题^①。崔先生指出，人们关于庄子生卒年代的判定根据是这样三点：一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的材料。《史记》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并受楚威王之聘。据《史记·六国年表》和出土的《竹书纪年》，可知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在位的时间分别是：前370—前319年、前320—前302年、前339—前329年。据此，可推断庄子的生卒年约为前375—前300年。梁启超《先秦学术年表》对庄子生卒年代的判定正是如此作的。二是《庄子》中的相关事件。《庄子》虽然是一部“寓言十九”（《庄子·寓言》）、“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觭见之也”（《庄子·天下》）的恣肆汪洋的书，但书中也有对庄子言行的记载；这些记载当然有可信的一面。据此，是可以推断庄子生卒年代的。《庄子》中涉及庄子言行的段落共有29处^②。其中有这样一些记载：（1）《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2）《庄子·山木》：“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縻系履而过魏王。”（3）《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4）《庄子·列御寇》：“庄子曰：‘……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5）《庄子·徐无鬼》：“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6）《庄子·至乐》中有庄子妻死，惠施前去吊唁，发现庄子却在鼓盆而歌，惠施于是就说庄子：“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根据这里的（1）和（2），“魏王”就是梁惠王（见司马彪注），对梁惠王称为“王”。另外，根据《庄子·则阳》“魏莹与田侯牟约”语，这里的“莹”就是梁惠王（见司马彪注），对梁惠王又称其名。可见，庄子生年当在梁惠王初年，至迟在梁惠王改元（前335年）之前。那么，庄子生当梁惠王改元“之前”又能“前”多少呢？《庄子·田子方》有言“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庄子·徐无鬼》有言“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魏文侯于前446—前397年在位，魏武侯于前396—前371年在位。这里对魏文侯、魏武侯皆称谥号，所以，庄子生年当在魏文侯、武侯之后了。根据这里的（3）、（4）、（5）、（6），可判定庄子的卒年。据（3），庄子

①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2—6页。

② 具体统计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6页。

当卒于惠施之后,而惠施的事迹最晚见于魏襄王五年(前314年)(见《战国策·赵策》三)。而据(4),庄子未尝见宋国之亡;据《史记·六国年表》,齐灭宋在齐湣王十五年(前286年)。在(5)中,据唐代成玄英的《庄子疏》,“秉”当为公孙龙。关于公孙龙的事迹,最早为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劝昭王偃兵(见《吕氏春秋·应言》),最晚为赵孝成王九年(前257年)劝平原君勿受封(见《战国策·赵策》三和《史记·平原君列传》)。若据此判定,庄子当卒于宋亡之后。但这条材料较弱,因为人们对这里的“秉”是否真的为公孙龙是有争议的。而据(6),庄子之妻是“老身”而死的,而《礼记·曲礼》曰“七十曰老”,可见庄子妻死时当在70岁以上;庄子死于其妻之后,大概寿在80以上了。综合这些材料,可知庄周生当梁惠王初年,其卒尚不及见宋亡。马叙伦判定庄子作为宋人,其生卒年当为宋君剔成元年(是年为周烈王七年、梁惠王二年,即前369年)至齐灭宋(是年为周赧王二十九年、齐湣王十五年,即前286年),就是依据这些材料。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通表》中判定庄子生卒年为前368—前268年,虽与马叙伦的判定在具体年代上有差异,但所据材料仍一致。三是有关其他线索。例如,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庄子》中说庄子“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在此他有一个注说:“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据《史记·六国年表》,齐湣王在位时间当为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至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年),这相当于宋君偃的在位年代(前328—前286年)。可见,庄子的主要生活年代当在前328—前286年这段时间。但此段时间只有42年,庄子不可能只活了这些年。另外,人们还知道,庄子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且稍后于孟子。如《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言:“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否?曰: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孟子的生卒年也有不同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时84岁,故其生年当为周烈王四年(前372年)。根据这些材料,当可推定庄子的生卒年代。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中就是如此来确定庄子生卒年的。

以上关于判定庄子生卒年代的三个“支点”,究竟哪个支点最为可靠、最接近或合于历史事实?这就很难说了。或许,将来的考古发掘能获得一些古代的史料以确定庄子等先秦诸子的生卒年代之谜!

2. 关于庄子的邑里国属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庄子者,蒙人也”。但蒙地在哪国?司马迁未指

明。所以,现今关于庄子的故里国属就有这样几种说法:庄子是宋人、庄子是楚人、庄子是齐人、庄子是鲁人^①。

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蒙地战国时属宋国,故庄子是宋人。汉代人就认为蒙地是战国时宋国的地域。如《史记·庄子列传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庄子“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五十二篇”,班固注说:“名周,宋人。”等等。战国时的宋地,西汉时封属梁国,如《汉书·地理志》说“梁国领县八,其三即蒙”。所以,唐代学者称庄子为梁国人。如《隋书·经籍志》说“《庄子》二十卷”,并注说“梁漆园吏庄周撰”。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庄子》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汉代人说庄子为宋人,唐代人说庄子为梁人,这两种讲法实际上是一致的,都认为庄子是战国时宋国人。今人马叙伦在《庄子义证》之附录《庄子宋人考》中,又提出了两条较有力的论据,一是《史记·宋世家》所据《左传·庄公十二年》的“宋万弑湣公于蒙泽”,另一是《史记·宋世家索隐》所据庄子佚文“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辟[按:辟乃宋桓侯的名字],蒙人止之,后为狂也。”这都证实了庄子是宋国人。宋之蒙地大致在今商丘市(归德府)境内,战国时此地与魏之东南、楚之东北接壤。

说庄子是楚人始于宋代。乐史从邑里归属上将蒙地归于楚,如他在《太平寰宇记》卷十二《宋州》中说:“小蒙故城在县[按:指宋州县,即今河南商丘市]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为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朱熹又从思想风格上将庄子列于楚文化中的人物,如他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中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底人物学问。”但说庄子是楚人的证据似不足。关于乐史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没有印证。对此,马叙伦在《庄子宋人考》中说:“宋亡后,魏、楚与齐争宋地,或蒙入于楚,楚置为蒙县,汉则属于梁国欤?庄子之卒,盖在宋之将亡,则当为宋人也。”至于朱熹说的庄子的文风有楚文化的特色,这确是实情。但不能因此就说庄子为楚人。其实,在《庄子》中对宋国情况的论说不少,如《逍遥游》的“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人间世》的“宋有荆氏者”、“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天运》的“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田子方》的“宋元君将画图”,《列

^① 关于庄子故里,参考了崔大华:《庄学研究》一书第6—9页的文字。

御寇》的“宋人有曹商者”、“宋国之深”、“宋王之猛”等,这表明庄子是宋人的可能性更大。

还有庄子乃齐人的说法。如六朝陈释智匠在《古今乐录》中记庄子之事曰:“庄周者,齐人也。”之所以认为庄子是齐人,是因为齐地也有“蒙”。《左传·哀公十七年》说:“公会齐侯盟于蒙。”晋代杜预注曰:“蒙在东莞蒙阴县西,故蒙阴城也。”清代的杨守敬在《战国疆域图》中就将这个蒙阴城归属于齐。但这里的蒙却不是庄周故里的蒙。如清人马骥在《绎史》卷一百十二《列庄之学》下中说:“周,蒙人,属宋不属齐”;阎若璩在《潜邱札记》卷六《又与石企斋书》中也说,蒙地属宋不当属齐。可见,庄子乃齐人说不足取。

至于说庄子为鲁人,是近人王树荣在《庄周即子莫说》(见《古史辨》第四册)中提出的。鲁有蒙地不假。如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蒙山即东蒙山,在鲁东,故云。邑人公鼫论:蒙山高峰数处,俗以在东者曰东蒙,在中央者曰云蒙,在西北者曰龟蒙,其实一山也。”可见,位处鲁东的蒙山与《庄子》中所记的庄子活动地域较远,是不可能成为庄子的故里的。

综合以上诸说,庄子为战国时宋之蒙人的说法是可取的。

3. 关于庄子的生平事迹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庄子的生平事迹只有两个方面:一是曾做过“蒙漆园吏”,另一是曾拒绝了楚威王的卿相之聘而“终身不仕”。但即使这两个简单的方面仍有研究的必要。

(1)“漆园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吏”者,小吏、官吏也。这从古到今一直没有问题。但人们对“漆园”的看法就不同了。汉代以来,人们一般将“漆园”作为一个邑里名称看待。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言“周尝为蒙漆园吏”,就是说庄周曾任过蒙地漆园这个小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则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无论漆园在蒙(今河南商丘)还是在曹(今山东曹县),总之都将其作为一个具体的地方来看待的。现代学者将“漆园”作为漆树之园^①,即种植漆树的园地。但这仍有思考之余地,“漆园”可作为种植漆树的园地,就不能作为加工漆的场地吗?再说,“吏”作为小吏

^① 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张恒寿:《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等等。

只是一种泛称的官职,那么庄子所做的这个“漆园吏”即管理漆园的小吏,其具体名称又是什么呢?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一书中对“周尝为蒙漆园吏”的问题作了新的考辨,颇有见地。崔先生援引了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的秦简史料,研究指出:第一,虽然从出土这则秦简的墓地的墓主生活年代看,他的生活时代晚于庄子;但从战国时代之阶级结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等的变化趋势来看,庄子和秦简墓主的生活时代的背景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即可以断定庄子所任宋之漆园吏,相当于秦的漆园啬夫。”^①第二,“啬夫”这一官长的称呼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流行,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大史曰:‘……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管子·君臣》说:“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韩非子·说林》下说:“晋中行文子出亡,过于县邑,从者曰:‘此啬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战国策·魏策》四说:“周最善齐,瞿强善楚,二子者欲伤张仪于魏。张子闻之,固使其人为见者啬夫,间见者,因无敢伤张子。”《鶡冠子·王铁》说:“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可见,从秦到齐鲁,三晋中原区域和南方楚地,皆通行‘啬夫’之称。宋处中原,自然也会有‘啬夫’的官职。”^②从这两方面的研究出发,崔先生还考察了《尚书》、《诗经》中的有关材料,说明漆的利用在春秋前就有,“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漆器需求量增多,漆的应用范围扩大,中原地区的漆树栽培也更加推广……这正反映了漆的种植和漆器制作在包括宋国在内的中原各国的手工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些都可以印证庄子是一位熟悉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曾任宋国管理漆园种植和漆器制作的吏啬夫。”^③

(2)究竟是何国诸侯王聘庄子为卿相的?关于这个问题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说法,即“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这一说法在《庄子·秋水》中就有,云:“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晋司马彪注说,这里的“楚王”是楚威王。唐代成玄英疏也说“楚王,楚威王也”。楚威王曾聘庄子为相,这是较通行的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两种说法。第二种是六朝陈释智匠在《古今乐录》

①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12页。

②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12页。

③ 崔大华:《庄学研究》,第12—13页。